

回应中国学者对《全球转型》的讨论

巴里·布赞 乔治·劳森

[内容摘要] 本文是对参与本专题讨论的中国学者观点的回应。我们认为,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或者认为两者是融合的这样的分析视角是错误和有害的。现代性是一系列概念和实践的集合,它们挑战了世界上包括西方世界中的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空间、时间和实际情况的不同使得每一个前现代和现代的综合体之间彼此都有显著的不同。就我们的论点对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启示而言,我们建议中国学者将自身历史融入到国际关系的研究叙事中,为更具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学的建立作贡献。而且中国学者还应该在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争论中作出贡献。我们认为世界正处于去中心化的深度多元主义阶段,近五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准确的,只不过遗憾的是当前世界朝着冲突式深度多元主义方向发展。

[关键词] 现代化 西方化 中国国际关系学 冲突式深度多元主义

[作者简介] 巴里·布赞,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乔治·劳森,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我们感谢所有中国同行对本书的认真阅读。从中国视角对本书的阅读和评价,让我们收获良多,这也激发了我们对中国学者的观点作出回应的兴趣。但是,我们不是针对每一位学者进行逐个回复,而是选择、整合参与讨论的所有学者的观点统一予以回应。首先,我们着眼于“西方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其次,探讨本书中哪些方面可能成为打开中国国际关系学新路的结合点。最后,正如余潇枫提出的,本书出版至今已五年,所以我们将关注这五年中所发生的事情如何映射在本书论点上。

一、西方化还是现代化?

首先,我们要指出的问题是,“现代化”是不是等同于“西方化”或者两者是融合的。这一问题在中国学者(但不限于)的讨论语境中经常出现。我们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这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因为这在讨论过去和未来时会引入一个巨大但错误的政治困境。诚如王江丽所说,对中国而言,现代性问题既是“传统”之于现代(这一点与西方的经历是相同的),^①但同时又是东方之于西方,因为出现权力角逐,且一些西方国家首先驾驭了现代权力模式。这种西方权力和现代性概念的双重挑战,不仅是中国,也是许多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现代性是一系列概念和实践的集合,它们挑战了世界上包括西方世界中的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每个社会都必须在前现代和现代之间找到一条持久的融合之路。在19世纪,一小部分西方国家加上日本实现了这一目标,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则不得不为此进行更长久的奋斗。任何人都不应该低估,即便是西方国家,为了追求现代化使命甚至到了不得不推翻其原有社会秩序的程度。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国家失败了,或者产生了不稳定的新旧之间的混合体。这一事实加上日本在最早阶段进入现代化国家之列,说明现代性并不是西方社会特有的自然进化的产物。

我们的主要论点是,空间、时间、实际情况的不同使得每一个前现代和现代的综合体之间彼此都有显著的不同。德国、美国、日本并非英国的复制品,而俄罗斯、中国、新加坡、韩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都在产生其自身独有的现代性版本。众所周知,现代性有多种形式,包括民主和威权、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而

^① 对于“传统性”的理解,我们并不是要在“现代性”和“传统性”之间建立一种二元性。“传统性”和“现代性”通常被用来当作旧的(坏的)和新的(好的)之间的评价标准。“传统”并不指代一套“真实的”、会被现代性所摧毁的价值观或实践。相反,我们想强调的是那些自称“现代主义者”的人试图利用或清除他们眼中社会的“传统”特征的方式。在这些计划里,“传统的”实践和信仰被抛弃、接受、保留、有时会创造。至于结果,就像我们在上文所述,是旧与新的混合。

资本主义也有多种形式。^① 尽管如此,在所有这些多样性之中,现代社会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共性,即所有国家都必须找到应对无情的技术和社会变革的途径,而如今所有国家都越发被迫寻找一条环境可持续发展之路。

罗森伯格(Rosenberg)部分源于托洛茨基(Trosky)影响而提出的“不均衡且融合性发展”(UCD)理论,为理解上述概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路径。与华尔兹认为无政府体系使国家成为“相似单位”(like - units)^②相反,罗森伯格主张,不均衡且融合性发展的驱动力必然会产生不同版本的现代性,因为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是不同的。“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并没有简单地重复先发国家的各个阶段,反而会呈现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各种形式的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渗透和塑造了各个国家接受现代性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日本得到了清晰的体现。日本无疑是现代的,但它并非仅仅是西方社会的一个复制,而是仍然保留着其历史中独有的特性。中国也是如此,在持续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将会保留很多“中国特征”,并找到自己独特的现代性形式。我们最近还从更多细节中讨论过中国与现代性的特殊遭遇,以及中国与“不均衡且融合性发展”理论的契合度。^③ 按照罗森伯格的理论,中国和日本即便他们愿意变为西方(其实并不愿意)也“不可能”变成西方国家。相反,西方国家就算愿意(其实不愿意)变得中国化或者日本化也“不会”变得中国化或者日本化。事实上,由于中国与日本有过许多共同的经历,而且在地理位置上也邻近,中国的现代化更多地受到了日本的发展型国家模式的影响,而不是西方模式。^④ 正如米特(Mitter)指出,“中国的改革派精英们借鉴过日本,

① S. N.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Vol. 129, No. 1, 2000, pp. 1 ~ 2;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Capitalism and the Emergent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0, Issue 1, 2014, pp. 71 ~ 91.

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 - Wesley, 1979.

③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China Through the Lens of Modernit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3, Issue 2, 2020, pp. 187 ~ 217.

④ Orville Schell and John Delury, *Wealth and Power: China's Long Marc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Little, Brown, 2013; Amy King, “Where Does Japan Fit in China's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http://www.theasianforum.org/where-does-japan-fit-in-chinas-new-type-of-great-power-relations/#>; Michael Yahuda,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Two Tigers Sharing a Mountain*, London: Routledge, 2014; Prasenjit Duara, *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Barry Buzan and Evelyn Goh, *Rethinking Sino-Japanese Alienation: History Problems and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并试图探索一个亚洲国家是如何实现军事化和工业化并且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无论好坏,20世纪中国历史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日本造成的。”^①因此,亚洲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不能”等同于西方化。如果中国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有效地、而且在我们看来必要地,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区分开来。

二、国际关系学的中国之路

任晓提问,我们的论点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有何启示?我们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中国需要把自身历史融入到国际关系的研究叙事中。如果国际关系学是由中国发明的话,那么它会和现在的国际关系学大有不同,因此要实现真正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就要超越地方性色彩,即不能像在学科创建时期那样过分依赖于西方叙事。^②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在现有的对国际历史的理解以及基于这些理解的理论基础上增加深度和广度。除此之外,中国历史应该让人们对国际社会的等级结构有更细致和更广泛的理解。学者们在这方面已经开始了不少研究,譬如莫凯歌(Greg Moore)对中国“面子”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的研究,^③秦亚青提出的“关系性”或“关系理论”,^④以及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有关“王道”的研究,^⑤这些都成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独特贡献。我们也非常期待更多类似的研究会出现。

① Rana Mitter, *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 ~ 1945 :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London: Penguin, 2013, p. 658.

②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③ Gregory J. Moore, "'In Your Face': Domestic Politics, Nationalism and 'Face' in the Sino-Japanese Islands Dispute," *Asian Perspective*, Vol. 38, No. 2, 2014, pp. 219 ~ 240.

④ Qin Yaqing, "Relationality and Processual Construction: Bringing Chinese Ideas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 30, Issue 4, 2009, pp. 5 ~ 21; Yaqing Qin, "Rule, Rules, and Relations: Towards a Synthetic Approach to Governanc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 Issue 2, 2011, pp. 117 ~ 145; Yaqing Qin,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8, No. 1, 2016, pp. 33 ~ 47; Yaqing Qin,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⑤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第二,要建立一个更加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学,我们不仅需要改变该学科的历史来源,还需要改变其对过去几个世纪历史的政治敏感性。譬如,从16世纪到19世纪300年间,西方和东北亚国家关系平等,甚至是西方国家处于劣势,^①对此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解析。对中国而言,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耻辱的一百年,关于此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正如张小明强调的,中国称这段历史为自己选择的创伤。它系统地将这一事实投射在支持其外交政策的宣传上。但是中国并不是唯一遭受这种羞辱的国家。面对现代性带来的冲击,包括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震荡,受屈辱的国家和人民还有许多,这是共同的经历,因此中国也应该将自身的经历放在更大的图景中去理解。^②说得委婉一点,除了国际关系学的后殖民主义学派,西方对这样的殖民历史还是缺乏足够的意识。这就导致了大多数国际关系研究未能理解殖民时期非西方国家所遭受的种族主义、欺凌和剥削的历史怨恨之深。这种强烈的不满情绪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最近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印证了东西方之间的张力。譬如,一些西方国家呼吁对新冠疫情的蔓延和紧急状态问责,而中国则认为这是西方国家的“殖民时期思维”。这类问题不仅不会逐渐消失,相反还会随着现代性的持续扩大和深化,更多的财富、权力、文化专制将被用来支持这种不满情绪,这一点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争论中已经可以看出,体现了气候变化谈判的一个特征。

所以,国际关系学需要一种更具有历史意识、基于全球视角的殖民时代案例作为其自我理解的中心,而中国国际关系学可以为此做出重大贡献。这个全球性的叙事需要双方的清醒认识。西方大国需要正视和处理帝国主义造成的暴力、剥削、认知的破坏。而中国则需要意识到,这些历史是不能作为逃避当代行为责任和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责任的工具。在西方国家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逐渐衰落的情况下,对历史的正确认知尤为重要。没有它,后西方时代的全

^① Shogo Suzuki, Yongjin Zhang and Joel Quirk, eds., *International Order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fore the Rise of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2014.

^② Barry Buzan and Evelyn Goh, *Rethinking Sino-Japanese Alienation: History Problems and Historical Opportun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球政治会被旧的恩怨所荼毒,而国际社会将会变得过于虚弱,也因此,在应对日益严重的全球经济问题、环境问题、恐怖主义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等一系列共同命运议程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虽然中国有理由不忘记其“百年耻辱”,但我们认为这不应该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指南。或许作为一个更合理的起点是,重新关注前现代的历史,那时中国和西方是在相对平等的条件下对待彼此。

第三,结合上面提到的不均衡且融合性发展理论,我们觉得有必要在“全球历史社会学”(Global Historical Sociology)^①与中国研究国际关系的路径之间建立一个更强的联系。虽然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倾向于历史研究方法,但他们似乎很少接触以全球历史社会学为代表的更具社会学和理论依据的历史研究方法。鉴于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传统的一部分,而全球历史社会学的部分根源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既令人惊讶,又是一个错失了的机会。而且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迫切需要探讨的问题。

第四,关于中美之间不可避免出现“权力转换危机”,以及中国可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或获取国际社会核心地位,针对这种现实主义的主导假设,中国应该多加质疑,因为现实主义的假设可能会产生一种冲突自我实现的风险。中国将成为新的唯一超级大国的假设与我们的论点大相径庭。我们认为全球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是财富和权力的去中心化,以及文化多样的多元政权。我们预想的、正在来临的全球格局是一个没有超级大国但有诸多区域强国的格局,且拥有很强的反对任何形式霸权的国际规范。在这个格局中,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几个大国之一。这种新兴结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多极化”,因为它不会以争夺整个系统的主导地位为特点。这样的争斗只有超级大国才能行使,而当今世界不会有超级大国。大国更有可能关注自己的区域,尽管大国彼此之间也会互相警惕。这种新兴的全球结构已经被赋予很多标签:如,“多边主义”(plurilateralism),^②“异

① Julian Go and George Lawson eds., *Global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② Philip G. Cerny, “Plurilateralism: 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 and Functional Conflict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Order,”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2, Issue 1, 1993, pp. 27 ~ 51.

极性”(heteropolarity),^①“共享的世界”(no one's world),^②“多节式”(multinodal),^③“多元式”(multiplex),^④“多样全球化”(polymorphic globalism),^⑤还有“多秩序世界”(multi-order world)。^⑥我们在书中称之为“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decentred globalism)。^⑦

阿查亚(Acharya)和布赞在布赞和肖恩堡(Schouenborg)的研究基础上,确立了“深度多元主义”(deep pluralism)概念作为一个综合标签,来描述这些发展。^⑧深度多元主义的国际社会或国际体系,不仅呈现财富、国力、文化权威上的去中心化,还标志着反霸权规范的确立,以及各种非国家行为体角色的壮大。他们认为,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将迎来一个深层意义上的多元主义世界,但这种深度多元主义是以“冲突式”(contested)形式出现还是以“嵌入式”(embedded)形式出现,我们仍有选择的空间。“冲突式多元主义”(contested pluralism)意味着对深度多元主义的物质现实和观念现实的实质性抵制。这样的抵制会有多种形式:各个国家会抵制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前超级大国(显然是美国)拒绝放弃他们的特殊权利和待遇;崛起的大国拒绝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中国和印度);大国拒绝承认彼此的地位,并将彼此视为对手或敌人进行竞争。“嵌入式多元主义”(embedded pluralism)意味着全球国际社会中的主要行为体不仅容忍深度多元主

① James Der Derian, “The Ques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2, Issue 3, 2003, pp. 441 ~ 456.

② Charles A. Kupchan, *No-One's World: The West, The Rising Rest, 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③ Peter J. Katzenstein, “Many Wests and Polymorphic Globalism,”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Anglo-America and Its Discontents: Civilizational Identities Beyond West and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207 ~ 247.

④ 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⑤ Peter J. Katzenstein, “Many Wests and Polymorphic Globalism,”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Anglo-America and Its Discontents: Civilizational Identities Beyond West and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207 ~ 247.

⑥ Trine Flockhart, “The Coming Multi-Order World,”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7, Issue 1, 2016, pp. 3 ~ 30.

⑦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⑧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Barry Buzan and Laust Schouenborg, *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义的物质、文化、意识形态和行为类型的差异,还会尊重甚至珍惜这些不同,以作为一种新共存体建立的基石。对“嵌入式多元主义”的另一种看法认为,它意味着保存和/或培养作为人类历史遗产的政治和文化多样性。^①“嵌入式多元主义”还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主体间的共同认知来支持,以共同应对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共同命运问题,这些问题囊括从气候变化和污染、大规模移民和大流行性疾病到管理全球经济和全球网络空间。深度多元主义很可能是区域化的混合,一些大国在势力范围上进行区域竞争,而如果大国的行为是负责的,则可能成为某种共同应对共同命运威胁的紧要议程。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应该为这些争论做出贡献,而王江丽、崔顺姬、李佳的观点顺应了这样的指向。当前,主导中国(还有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话语总是在重复对“多极化”国际秩序的渴求。很显然,此处的“多极化”意味着反对霸权,特别是反对美国霸权。但是,作为一个替代性国际秩序的意象,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空白的。中国和俄罗斯在谈到他们想要的多极世界时,其实对其构成方式、拥有的机构、服务的目的和宗旨以及运作方式等,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方案。这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来说或许是个机会,他们可以在其政府外交政策的修辞框架内开展工作,并同时展开辩论,并为后西方世界秩序的建构提供一个中国角度。

三、从后来发生的事件中检验本书的论点

“亲爱的,是事件啊,事件!”(Events, dear boy, events)^②这句通常被认为出自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的短语,很好地抓住了预料之外的事件如何具有改变政治的能力。自从2015年我们的书《全球转型》出版以来,世界确实发生了很多“事件”,其净效应是加速了深度多元主义世界的到来。

^① Robert H. Jackson, *The Global Covenant: Human Conduct in a World of Sta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3.

^② 这句话用来表示政治的不可预测性。

遗憾的是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格局看上去更像是冲突式的而不是嵌入式深度多元主义。美国和中国在全球经济和亚洲地区的主导地位问题上都采取了强硬的态度。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已经突然放弃了作为世界领袖的角色。这不仅将全球制度和合作置于危险的境地,还对中国产生影响,促使中国更加大胆的追求多极世界。中国是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下的巨大受益者,但看起来中国承担领导重任的愿意并不强烈,而且它所获得的国际支持也太少。美国也毫不犹豫地撕毁合约,蔑视政府间国际组织,疏远盟友,并且采取强硬的经济制裁,这些措施会日积月累地腐蚀国际经济秩序。这种激烈的竞争伴随着全球自由主义危机,因此在自由主义的腹地,全球化和人权都遭受了严重的攻击。特朗普、英国脱欧、欧洲移民问题都已使整个西方国家,特别是英语文化圈国家,从其在全球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撤出。这些趋势扩大了人们转向冲突式多元主义的倾向,因而削弱了全球国际社会的管理基础。

正如我们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抗衡这种趋势的主要力量应该来自这样一种意识,即来自共同命运的威胁正在增加,而这些威胁只能通过有效的国际合作加以解决。在这方面,过去五年的记录充其量是好坏参半。2015年达成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可能是一个高潮,这是一个理想的共同命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敌对意识形态框架的影响。^①但是美国已经从这项协议退出,而中国并没有意愿去充当气候变化问题的领袖,尽管这与中国国内政策相契合。用于管理全球经济的规则和制度继续衰落,并朝着各个分割的地缘经济方向转移。如今正在流行的新冠病毒危机或许能成为另一个推动世界局势朝着嵌入式的深度多元主义方向发展的机遇,但迄今为止,这一点并没有发生。相反,共同的命运和由此产生的威胁大多被用来煽动大国之间的互相指责。虽然解决这种朝着竞争式深度多元主义的转变还为时不晚,但当前的发展方向并不乐观。

全球化的一些方面,最显而易见的是在没有全球政府情况下的经济成果,可

^① Robert Falkner and Barry Buzan, "The Emergence of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as a Primary Institution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5, Issue 1, 2019, pp. 131 ~ 155.

以是选择的结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人们感到他们不再是在正确的道路上,政策决定是可以改变的。但全球化的另一方面,诸如气候变化、污染、物种灭绝、大规模迁徙和全球流行病的威胁,是结构性的,这些威胁都难以或不可能由政策选择所挽回。当前世界朝着冲突式深度多元主义方向发展,将全球国际社会置于一个冲突的轨道上,而被削弱的全球管理能力最终将陷入一种或多种不可回避的全球共同命运中。这个令人不快的结论,提供了一种自 2015 年以来世界政治中的事件与我们本书的中心论点是相吻合的主要依据。